

对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期望

——在《年鉴》座谈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

同志们：

党的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向全党、全国人民提出了坚持独立自主和对外开放的外交政策。随着我国外事工作逐步开创新的局面，全国人民正在掀起研究和学习国际知识的热潮。在这样的情况下，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出版了，它将会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这是世界知识出版社办的一件好事。我表示衷心的祝贺。

《世界知识年鉴》已经近二十年没有出版了。1982年《世界知识年鉴》比以前出版的年鉴在内容、在装璜上，都有明显的进步。这是一个贡献。我向年鉴的编辑、作者和有关人员表示感谢和慰问。

《世界知识年鉴》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它对于人们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更好地开展对外工作肯定是有帮助的。我相信，这部书会在社会上享有一定的声誉。当然，“年鉴”由于多年中断出版，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不足。但我认为，只要认真地总结经验，便会不断地求得改进，把“年鉴”编得更好。

今天，外交、文化、出版、社会科学界等各方面的同志和学者聚集一堂，座谈这部年鉴。这是对今后年鉴编辑和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的积极支持和推动。

世界知识出版社是研究国际问题的一个重要出版社，必须把它办好办活。不仅要提高现在的《世界知识》期刊的质量，在可能的情况下还要增办别的期刊。更重要的是要多出书、出好书。凡是有关国际问题的书，只要是内容好都可以翻译出版，如外交、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历史、国际法、国际关系、国际人物、列国志等等。特别要强调的，应多组织国内的研究国际问题的作者、专家撰写国际问题的著作。我们中国是个大国，在国际问题上应该有自己的言论和看法。世界知识出版社的同志应打破老框框、老办法，要同国内外的出版社、国际问题研究机关建立广泛的联系，特别是同国内外外事部门建立密切的关系，开拓更多的稿源，认真编辑、出版、发行，努力开

创出版工作的新局面。

外交部各地区业务司、驻外使领馆、中央和地方各涉外部门、科学研究机关，要积极支持世界知识出版社，多予关心和帮助，经常为他们撰写文章和书稿。不断丰富、提高、扩大书稿内容、数量，使之多样化。

我希望经过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使得有关国际问题书刊的出版，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从而为满足广大读者了解国际形势、外交政策的需要，普及国际知识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1983年1月20日

世界在动荡中前进

——综述一九八二年以来的国际形势——

1982年,美、日、西欧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泥潭里越陷越深。苏联、东欧等经济景况黯淡。西方转嫁危机使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遇到了重重困难。进入1983年,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经济仍象重病患者。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和“经济专家”评论西方经济形势时,有的认为“略有起色”,有的则说“沉痾难愈”。

经济危机加剧了许多国家的国内阶级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这些矛盾反映在社会动乱和政局不稳上。同时,也加剧了两霸争夺和国际冲突,局部战争没有一天停止过。两霸争夺的新特点是:在基本上仍是苏攻美守的同时,出现互有攻守,甚至在特定的时间与地点美攻苏守。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的独立自主倾向在发展。两霸与其各自盟国之间分别加剧了控制与反控制斗争。第三世界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压迫、剥削的同时,努力寻求团结合作的新途径。

在举世动荡中,中国的形势却十分令人鼓舞。党的十二大确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纲领。五届五次人大通过了治国安邦的新宪法和切实可行的第六个五年计划。这一年多来,国民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出现顺差,国力不断雄厚。在对外关系上,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立场受到各国的重视和赞扬。最近,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召开,将进一步鼓舞和动员全国各族人民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保证国家在各方面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和经济建设健康的发展。现在十亿中国人民正信心倍增地向着光明的未来迈进!

第一部分: 严重的经济危机激化了资本主义 国家固有的矛盾和国际冲突

西方经济在谷底长期徘徊

从1979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发达国家普遍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1982年，危机向着广度和深度发展。直到年底和1983年年初，西方舆论宣传经济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从统计资料看，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生产有所回升，但是这种回升是有气无力的，到1983年年中，西方还没有从谷底爬出来，形势仍然严峻。如美国政府所承认，巨大的财政赤字可能扼杀刚露头的经济回升，并使“缓慢的复苏流产”。

这次经济危机发生在“滞胀”（即生产停滞、通货膨胀并存，在危机之前没有出现过大的高涨）的情况下，其特点是：

（一）持续时间长。这次危机的持续时间已相当于或接近于1929—33年的大危机（英国41个月，美国38个月）。美国经济从1979—80年开始萧条，从1981年起坠入更深重的衰退，直到1982年11月还“看不到隧道尽头的阳光”。欧洲共同体十国的工业生产连续11个季度处于下降和停滞状态。英国、西德、法国等一些主要工业生产国长期在谷底徘徊。甚至被称为经济“优生”的日本，到1982年年底，萧条也已有34个月，超过三十年代大危机时的31个月。危机持续时间之长，说明资本主义各国政府对于经济“痼疾”越来越束手无策了。

（二）生产下降的幅度逐步增大。进入1982年后，被称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4个成员国的工业生产出现了两次大幅度下降。七大国（美、日、西德、英、法、意、加）的工业生产1982年降低了4.25%。美国1982年年底工业生产指数跌到了1977年2月的水平，即倒退了70个月。

就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看，美国1982年比1981年实际下降1.8%，是战后下降幅度最大的一年。欧洲共同体十国的增长率只有微不足道的0.3%，欧洲自由贸易区七国的增长率几乎等于零。以经济高速增长闻名的日本，1982年增长率只有2%。

（三）波及面越来越广。这次危机的波及面大大超过了战后的历次危机。除各传统工业如钢铁、汽车、建筑、纺织等业普遍衰退外，还波及机器制造，甚至象炼油、电子等先进工业部门也发生了生产过剩现象。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了军火等个别行业外，无论是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的生产量、销售量和利润率都下降了。

不但工业危机在蔓延，农业危机也在深化，1982年美国小麦和玉米分别过剩503万吨和549万吨。

（四）破产、倒闭创战后最高纪录。资本主义国家的许多公司企业由于市场萧条、产品过剩、亏损严重、债务象滚雪球似的增加，到1982年中，美国公司总债务额约占总资本额的60%以上，付息费用占资本额的11%到18%。到1982年年底，美国破产企业总数达2万4千多家，破产率为0.85%，是三十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高纪录。法国、英国等西欧国家的企业破产数也急剧增加。连经济状况一向较好的西德也不能幸免，1982年西德企业破产总数达1万6千余家。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有一些根基很深的大企业也维持不下去了。例如，具有54年历史的美国第十大航空公司——布兰尼夫航空公司于1982年5月破产。西德第二大电器公司葛益吉—德律风根公司（即西德电气总公司）于1982年8月申请法院部分接管。甚至美国两大通讯社之一、成立于1907年的合众国际社也因亏损严重而被迫转让给新闻传播公司了。

（五）失业空前严重。企业大批破产和严重开工不足造成失业增加。在24个发达国家中共有3,200万人的失业大军。1982年，美国失业队伍达1,210万人，失业率为10.8%，创42年来的最高纪录。欧洲共同体十国失业的总人数约与美国相等，即在1,200万人左右。据共同体统计局公布的材料，1982年失业率在10%以上的有比利时、爱尔兰、英国、荷兰、意大利等，在8%以上的有丹麦、法国、西德等。

(六)财政恶化。1982年,各发达国家出现了惊人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美国里根政府上台时曾信誓旦旦地说要逐步减少赤字,到1984年实现“预算平衡”。但执政两年多,赤字非但不减,反到直线上升。1982财政年度(从1981年10月到1982年9月)的赤字为1,107亿美元,相当于迄二次世界大战中期为止的154年的赤字总和,创造了历史最高纪录。而1983财政年度上半年(从1982年10月到1983年3月)赤字高达1,292亿美元,超过上一财政年度全年的赤字。这一财政年度的赤字比上年翻一番已成定局。欧洲共同体国家的财政赤字平均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5%(其中荷兰占15%、意大利占14%、比利时占12.7%)。1982年,日本财政赤字比上年增加了一倍。

庞大的财政赤字迫使政府大量举债,美国国债已接近1万2千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欧洲共同体十国政府的债务总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日本的国债到1983年末将超过1百万亿日元(约合4千1百亿美元)。政府大量举债直接助长了金融市场利率的提高,影响对企业的投资,也促使企业破产和失业问题更加严重,造成恶性循环。

(七)危机的并发性与国际市场萎缩。这次危机的同期并发性(即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几乎同时陷入危机),使相互转嫁危机更加困难。同时,由于经互会国家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也陷于困境,使国际市场全面萎缩。1982年世界出口量比1981年下降2%,出口价格下降约3%,贸易总值下降约5%。居世界贸易首位的欧洲共同体,1982年逆差达150亿美元。竞争力较强的日本,1982年出口总额也比上一年度减少10.1%;进口总额减少10.8%。

(八)严重的国际债务问题。国际债务增加和货币比值不稳都是经济形势不妙的反映。1982年,发展中国家和经互会国家的债务总额约达7,060亿美元,其中一些国家已经远远超出“债务危险线”(即每年须偿付的本息占出口收入的20%至25%)。甚至某些发达国家也由于外债过多而发生支付困难和货币信用危机。沉重的债务不仅阻碍世界市场繁荣,而且迫使信贷收缩,如果一旦发生许多债务国丧失偿付能力的情况,就可能爆发一场后果极其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

苏联:大家庭度日艰难

1982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经济状况十分严峻的一年。它没有完成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如:国民收入原计划提高3%,但实际只增长2%;工业总产值原定提高4.7%,实际只有2.8%;工业劳动生产率原定提高4.1%,实际只有2%。在苏联国民经济总投资中,农业占四分之一,但是苏联农业已经连续4年歉收,不仅投资得不到回收,而且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1982年苏联象前几年一样,大量进口粮食,支付了巨额外汇。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供应长期存在着紧张。它的基本建设投资大、战线长,但效益差,交付使用的计划没有完成。在国际收支方面,尽管苏联在1982年向西方抛售了150吨至200吨黄金,但外债仍有90亿美元。

苏联经济困难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为了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苏联畸形发展军工生产和军事科研,成为沉重的负担。1983年美苏进一步加剧军备竞赛,苏联势必还要大幅度增加军费开支。阿富汗、越南、古巴等都成了填不满的“无底洞”,每年花掉苏联大量的物资和金钱。再加上波兰的包袱和美国的经济制裁等,都增加了苏联的困难。从国内来看,苏联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一、苏联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开发条件日渐恶化,不得不转移到条件较差的东部和北部地区去。二、劳动力紧张,特别是缺乏熟练工人和科技人员。三、苏联正处于技术改造时期,需要大量资金,但由于国民收入增长率和积累率降低,资金比较短缺。四、生产效率下降。五、经济管理体

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应该指出,从1982年和1983年上半年情况看,苏联经济与陷入深重危机的西方相对而言,还是困难比较小的。

东欧各国的经济情况很不平衡。从1982年计划执行情况看,民主德国完成得比较好,其次是保加利亚。匈牙利情况较差,国民收入只增长1%(原计划规定增长2—2.5%),粮食比上一年减少1百万吨。捷克斯洛伐克更差,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均未完成计划,国民收入只增长0.2%,等于停滞,农业歉收,粮食欠产160万吨。至于波兰,由于政局动荡,经济上遭受了近30多年来最大的挫折。国民收入下跌13%,工业生产下降19%,重要的出口商品硬煤减产3千万吨。除农业略有增产(纯产值增长3%),其他所有经济部门产值都下降了。

东欧各国在燃料、原料和资金等方面的困难有增无已。东欧的石油主要依靠苏联供应,但近年来苏联的石油产量增长不多,而向西方销售量却不断增加。结果,不但不能满足东欧的需要,而且价格不断上涨,使东欧的经济大受影响。

东欧各国的债务负担十分沉重。它们在七十年代曾经向西方国家大量举债、引进技术设备以发展工业。但是,西方经济危机使国际市场日益萎缩,东欧各国的工业产品缺乏竞争力,出口困难,而大宗债务却到期需要偿还,形成了严重的问题。到1982年年底,波兰外债累计已达300亿美元,民主德国约120亿,匈牙利70多亿,保、捷分别达40亿。据西方报刊分析,东欧主要债务国每年必须将其出口所得外汇的40%,甚至更多地用来还债,波兰1983年还债数字相当于出口收入的90%以上。有的国家不得不请求西方债权国延期还债。

发展中国家受到严重损害

在危机中,由于发达国家向第三世界转嫁危机,使后者受到了严重损害。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原料和初级产品的出口国,这类物资的出口量一般占其总出口量的85%,而出口对象主要是工业发达国家。1982年后者因生产下降,大量减少原料和初级产品的进口,并大幅度压低价格,甚至抛售库存,使前者蒙受很大损失。1981—82两年,世界原料和初级产品价格平均下降30%以上,跌到半世纪以来的最低点,如1981年6月,橡胶下降37%、铜下降35%。发达国家还对发展中国家产量有限的工业制品采取提高关税、规定进口限额和限价等办法以限制进口。

原料和初级产品出口减少和价格下降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场灾难,直接造成工农业生产停滞,城市失业率上升,农村破产,人民生活贫困化。

1982年,非产油的发展中国家国际收支逆差超过1千亿美元,连石油输出国组织也出现了第一次逆差(估计约有180亿美元)。拉丁美洲各国外贸赤字达330亿美元。许多非洲国家发生粮荒,外汇收入的20%要用于进口必需的粮食。逆差迫使它们举债。而发达国家借口萧条,减少官方外援和贷款,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向私人金融机构以极为苛刻的条件借债,高利率加重了债务国的负担。1982年发展中国家的外债总数达6,260亿美元,相当于它们商品和劳务出口的22%。有的国家几年来都是借新债还旧债,有的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

但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直接影响市场缩小,反过来也不利于西方工业国摆脱危机、复苏经济。

西方社会不安和政局动荡

持续的经济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加剧了社会不安和政局动荡。

美国里根政府上台以来一直推行“劫贫济富”政策,即:对垄断财团少征税收,对工人和贫苦大众大砍福利经费,以减少政府开支。1983年年初,美国失业职工中能够领取救济金的仅占33%。

“福利国家”大砍福利,是目前西方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五十和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上升时期,垄断资本家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采取高工资、高福利、高消费政策。英国自吹为“最早的福利国家”,荷兰被称为“最慷慨的福利国家”,丹麦号称“福利国家的标兵”。但是,曾几何时,这些国家都为减轻财政负担而向“福利”开刀。英国已经取消了按工资多少领取失业救济金的办法,1983年,计划减少社会保险金,使领取养老金和残废者的生活大受影响。荷兰宣布在1983年冻结所有福利开支。丹麦取消在职人员的物价补贴,减少失业补助金。西德1982年每人福利费比1980年减少了12.5%。法国1982年的福利开支比前几年下降了67%。

危机的深化触发了阶级矛盾的深化。为了对付垄断资本集团转嫁危机,1982年西欧工人的罢工斗争有所发展,工人上街游行示威的事件此起彼落。在美、英、西德、挪威、比利时等国,工人运动的矛头直接指向执政当局。

在危机冲击下,不管是资产阶级右翼政党,还是自诩为“左翼”政党,无论是一党执政还是多党联合政权都找不到出路。普遍的情况是,谁在台上执政,谁的日子就不好过。它们有的主张增加税收和国债,进一步削减福利和公共开支、紧缩信贷以对付通货膨胀,有的则认为应加强政府干预、刺激生产、缩小失业队伍;但谁也拿不出解决经济危机的锦囊妙计。

经济困难直接影响到各国的政局,各发达国家象走马灯似地频繁改组政府。1982年内阁倒台的有:芬兰、丹麦、瑞典、荷兰、意大利、爱尔兰、西班牙等国。日本铃木首相被迫挂冠而去;西德以施密特总理为首的社民党和自民党联合政府黯然垮台。希腊、葡萄牙等国也因经济缺乏办法而改组内阁。美国于1982年11月举行中期选举,民主党利用选民对里根的共和党政府经济政策失败的不满,在众议院中夺走26个席位,在各州政府中夺走7个州长职位。在美国中期选举中,执政党被反对党夺走如此之多的席位是少见的。

渺茫的前景

从1982年年底到1983年年初,美国和西欧经济出现了“回升”迹象。但不论美国或西欧,经济回升都是乏力的、微弱的和不稳定的。

以美国为例,从1982年12月起,工业生产指数有所上升,建筑、汽车、钢铁等部门出现微微好转,通货膨胀有所缓和,市场销售情况稍有起色。加以世界石油价格下跌,美国捞到了意外好处。但是,里根政府既不可能放弃减税,也不可能减少军费支出,对民用开支和社会福利开支已经一砍再砍,无法再压缩,因此,它解决不了财政赤字问题。1983年美国政府在货币市场的借款总额估计将达私人储蓄总额的73%。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利率很难降下来,而高利率又必然遏制固定资本的投资,从而阻碍经济的复苏。其次,经济回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消费的增长。但是,上千万的失业大军使社会购买力下降,而且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和科技发展,失业问题可能日趋严

重,至少短期内不可能解决。总之,西方经济的前景仍将是严峻而渺茫的。

第二部分: 经济和政治的困境削弱了两霸力量, 加剧了它们的争夺。在欧洲, 两霸为核优势而紧张较量, 在世界许多地区, 加紧夺取战略要地

1982年两霸面临的经济和政治困境削弱了它们控制世界局势的能力。其结果是:一方面,双方都担心对方会利用自己的弱点抢占优势,压倒自己,因而相互争夺更加剧烈;另一方面,由于双方都有困难,都力不从心,因而也不得不经常调整策略,不时以谈判和对话来掩盖它们激烈争夺的实质。从总体看,两霸的实力大致相当,所以,1982年苏攻美守的基本态势虽未改变,但出现了双方互有攻守的局面:即苏攻中有守,美守中有攻,有时甚至出现美攻苏守的情况,从而使1982年的国际形势更加紧张动荡,复杂多变。

美苏加紧军备竞赛

美国里根政府为了争夺对苏的军事优势,1982年开始实施五年耗资1万6千亿美元的全面扩军计划;它加紧研制并决定在西欧部署中程核武器(包括108枚潘兴II式导弹和464枚陆基巡航导弹),提出了部署100枚MX洲际导弹的计划;决定拨款建立能经受住核大战的通讯联络系统,组建了中东、波斯湾和印度洋地区的新军事司令部——中央指挥部,统一指挥拥有23万兵力的美国快速部队。

苏联对这场新的军备竞赛也不甘示弱。勃列日涅夫临终前对军事领导人的讲话和安德罗波夫上台后的多次讲话都一再强调,苏联在军备和军事技术的竞争中是不允许落后的;说为了对付美国的挑战,苏联将部署相应的武器系统,用同类的导弹来对付美国的导弹。苏联用于发展武器的费用早就超过了美国。现在它已经大量部署了第四代洲际导弹;第五代洲际导弹正在加紧试制。

但是,美苏双方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反核运动的强大压力,都迫使两霸继续抓住“缓和”的旗帜,接二连三地提出“裁军方案”,不厌其烦地进行裁军谈判。美国继1981年底提出关于欧洲中程导弹的“零点方案”后(即苏联拆除已部署的中程核导弹,美国放弃部署潘兴II等新导弹),1982年又先后提出分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方案和削减中欧常规部队的建议,从而导致了1982年苏美之间和华约与北约之间同时进行三场裁军会谈:战略核武器谈判、中程核武器谈判和中欧裁军谈判。苏联在对西欧保持压力的同时,也先后提出了冻结部署欧洲中程导弹的建议、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建议、减少战略武器25%和削减欧洲中程武器三分之一以及苏美首脑举行会晤等建议。其实,这些建议和谈判的目的都在于互相摸底、限制对方、欺骗舆论、掩盖扩军。谈判不过是它们争夺核优势的另一种形式而已。

争夺战略要地 插手地区冲突

两霸在欧洲争夺军事优势的同时,对战略要地的争夺也日趋激烈,有时双方还间接地卷入地

区冲突,加剧了紧张气氛。

一年来,美国利用苏联的经济困难和最高领导的更迭以及阿富汗、波兰、越南、古巴等沉重包袱,在局部地区和有关问题上采取攻势,对苏态度趋于强硬。特别是在中东,美国支持和纵容以色列于1982年6月大举入侵黎巴嫩南部,打击和削弱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力量,迫使一万多名巴解组织战士分散转移到几个阿拉伯国家。然后,美国又以调解人的身份提出中东和平方案并参加多国部队进驻黎巴嫩,使苏联处于被动地位,进一步削弱了苏联在中东的影响。美国还利用波兰的局势,加紧对东欧的渗透,并对波兰和苏联实行经济制裁,对它们施加压力。在中美洲,美国加紧对萨尔瓦多、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危地马拉等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形成对尼加拉瓜的包围圈,力图扼杀新生的尼加拉瓜政府,企图把苏联的影响逐出这一地区。在南非,美国对安哥拉软硬兼施,力促和平解决纳米比亚问题,逼迫古巴军队撤出安哥拉,从而要把苏古军事力量挤出南部非洲。

对于美国的这一系列攻势,苏联进行了坚决的反击。在中东,它大量增派驻叙利亚的军事顾问和武装人员,迅速补充了叙利亚受损的武器装备,利用阿拉伯国家的内部矛盾,力图重新恢复在中东的发言权。在欧洲,苏联利用西方经济危机和美欧矛盾,频频发动和平攻势,突破西方对苏的经济制裁,离间欧美关系。在拉丁美洲,苏联利用中美洲各国的内部矛盾,以古巴为桥头堡,加紧向这个地区渗透扩张;苏联还利用英阿马岛冲突中拉美国家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扩展它在西半球的影响。在南部非洲,苏联力图稳住自己的既得阵地,保持在安哥拉的古巴驻军。

综上所述,1982年苏美争夺的特点是,一方面更加激烈和紧张,另一方面因为处境困难又不能走得太远,特别要避免军事上的直接相撞,因而国际形势保持着一种紧张而又僵持的局面。

第三部分: 第三世界国家在反帝、反霸斗争中加强团结 和合作。第二世界增强了独立倾向,世界 向着“多极化”发展

沉重打击两霸的全球战略

1982年第三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虽然大多处境艰难,但它们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仍在向前推进,相互间的团结与合作得到了加强,团结反霸的事业取得了一系列新胜利。

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地区霸权主义侵略的战争已经坚持4年多了。1982年,形势朝着有利于柬埔寨的方向发展。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柬埔寨人民抗越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在军事上,继反击越南侵略军第四个旱季攻势(1981年11月到1982年4月)之后,又取得了雨季(1982年5月到10月)战斗的新胜利。民柬不但巩固了山区根据地,它的控制区和游击区已从边境丛林山区向内地纵深延伸,并已从立足于靠近泰国边境地区打击越军侧翼,发展到立足于内地威胁越军主要据点和交通干线。在国际社会上,民柬赢得广泛的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支持民柬合法席位和要求越军全部撤出柬埔寨。从各方面看,民主柬埔寨的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

越侵略军虽仍占优势,但其进攻势头已是强弩之末。1983年旱季攻势推迟发动,并把全面进

攻改为重点突破，反映了越南侵略力量的衰退。它不但在军事上没有出路，而且在外交上孤立，财政经济上捉襟见肘，人民生活艰难。为摆脱困境，越南在继续武力镇压的同时，力图利用柬埔寨问题上出现的妥协倾向，在宣传上和外交上不断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抛出所谓“区域性会议”、“部分撤军”等等诱饵，企图麻痹世界人民，分裂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和分化东盟各国。但越南的这种企图遭到一次又一次的失败。

阿富汗人民反抗苏联侵略的战争进行3年多了，尽管苏联投入了10余万兵力，使用了一切现代化常规武器，甚至使用化学毒剂来残杀阿富汗人民，但苏军所能控制的仍只是主要城镇和交通干线。

阿富汗抵抗力量在战斗中不断发展壮大。1982年5月，7个较重要的游击队组织加强联合，成立了阿富汗自由战士伊斯兰联盟。据报道，到1982年底游击队共打死打伤苏军近2万人（其中包括一些将级军官），击落苏机160架，击毁坦克2,500辆。苏联为侵略阿富汗每天要消耗军费600万美元。卡尔迈勒政权的傀儡军不愿为苏联卖命，纷纷向游击队投诚、起义，或开小差逃跑，原有的9万傀儡军只剩下3—4万人了。

苏联侵略阿富汗，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1982年的第三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再次要求苏军立即撤出阿富汗，使苏联更加孤立。

在纳米比亚独立问题上，非洲前线国家坚持原则，坚持斗争，使美国支持的南非种族主义当局陷于更加被动和孤立。安哥拉、莫桑比克等国家多次粉碎了南非的侵犯。

第三世界国家在反霸斗争中增进了团结和合作，发展了休戚与共的关系。巴基斯坦等伊斯兰国家大力支援阿富汗人民。泰国等东盟国家坚决支持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为了反对美国指使以色列侵略黎巴嫩，阿拉伯国家内部正在探索团结的道路。1982年9月，在摩洛哥非斯城举行的阿拉伯首脑会议通过的中东和平方案，就是阿拉伯国家逐步采取相互接近立场的产物；戴维营协议后在阿拉伯世界遭到孤立的埃及，也改善了与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在英阿马岛战争之后，拉丁美洲国家的一些有影响的政界人士为了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正在酝酿成立一个包括所有拉美国家但没有美国在内的区域性组织。有的拉美舆论主张，在拉丁美洲，要以“拉美主义”代替“泛美主义”。

在第三世界国家之间，1982年出现了捐弃成见，相互接近的现象。关系紧张了15年的阿曼和南也门在1982年10月签订了关系正常化协议。1982年11月，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访问新德里，印巴关系开始松动。1983年6月，印巴联合委员会举行了第一次会议，获得良好的成果。1983年2月，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在两国边界会晤，为实行两国关系正常化、和平解决西撒哈拉问题以及促进西北非和平与稳定开始采取实际的步骤。

在国际社会中，第三世界主张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反对超级大国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犯别国领土；反对军备竞赛和战争威胁；要求把地中海、印度洋、拉丁美洲等划为和平区与无核区。这些主张打击了霸权主义者的全球战略。

但是，第三世界国家由于发展的情况各不相同，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错综复杂，往往给霸权主义者以分化瓦解、挑拨离间甚至渗透干涉的机会，在反霸斗争中也不时出现摇摆和妥协的现象。不过从总的看，第三世界国家要巩固和发展独立，要维护和平与安全，必然要团结反霸，这是客观形势决定的，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不结盟运动的生命力

不结盟运动是当今国际社会中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其成员国已达101个,包括了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绝大多数独立国家,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自主、彼此团结的意愿和倾向。

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原定于1982年9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召开,因受两伊战争影响,改为1983年3月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会议通过了《新德里文件》、《政治宣言》、《经济宣言》等重要文件。会议要求“全面重建国际秩序”,以扭转目前在世界上存在的“争夺势力范围、统治地位和军备竞赛”的趋势;重申不结盟政策的精髓是反帝、反殖、反对种族隔离和种族主义,反对一切形式的外国侵略、占领、统治、干涉或霸权。第七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的上述主张和第三世界广大人民在政治上争取进一步独立的解放斗争紧密相连。

在这次会议上,美国里根政府由于在第三世界推行霸权主义政策,把自己置于同多数不结盟国家对立的地位,在非洲、中东、海洋法、种族歧视、军备竞赛、南北对话中持僵硬立场,受到了指名或不指名的谴责。一贯伪装为不结盟运动“天然盟友”的苏联由于支持越南侵占柬埔寨,尤其是直接出兵入侵阿富汗,霸权主义面目进一步暴露,也处于被告地位,所谓“天然盟友”的招牌遭到了不结盟国家的摒弃。

由于不结盟运动成员众多,处境和政治倾向各异,两霸对它们的威胁程度也各不相同,因而在不少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和矛盾。但是从第七次不结盟首脑会议全部过程来看,更多的成员国投入了反霸和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说明不结盟运动仍具有强盛的生命力。

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而奋斗

1982年世界经济的不景气,使南北矛盾更加尖锐化。第三世界国家在克服困难、发展经济和民族独立的斗争中,愈来愈认识到,它们必须进一步建立真正独立的民族经济和加强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合作。这虽然是一个艰难的长期发展过程,但是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十二大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种合作有助于冲破现存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

旧的国际经济秩序是第二次大战结束后建立起来的,其实质是发达国家操纵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命脉、富国剥削穷国、国际垄断资本掠夺广大的第三世界人民。为了打破旧秩序,第三世界国家要求消除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上的垄断,争取各主权国家的经济权益平等;改善贸易条件,建立公正的贸易制度;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合理解决债务清偿问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资金;促进国际科技合作和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技术转让等等。发展中国家为了废除旧秩序,建立新秩序,与发达国家在联合国内外进行了长期的谈判,但没有取得应有的结果。1981年10月,在墨西哥坎昆举行了“关于合作与发展的国际会议”(即“坎昆会议”)。这是一次全球性的最高级会议,有22个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与会,国际舆论称这次会议是“南北谈判”。但由于美国顽固坚持僵硬态度,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就更加突出了。

1982年2月,4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参加了在印度首都新德里召开的“南南合作会议”(又

称“新德里磋商”),探讨南南合作的方向和原则。

1983年4月,来自亚非拉各国的70名学者和政治家在我国北京举行了“南南会议:发展战略、谈判及合作讨论会”,就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南北谈判和南南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同月,第五届77国集团部长级会议在阿根廷开会,125个国家的政府代表就稳定商品出口收入、限制保护主义、改革国际货币制度和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困难等问题协调了立场。

南南合作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地区性合作不断发展和巩固。到1982年年底,第三世界建立的区域性和半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已达25个,原料生产和输出国组织20多个,金融货币组织近20个,参加这些组织的国家约占第三世界国家总数70%。1982年,除原有的各种地区性组织外,中非、东南非、南亚、海湾国家和拉丁美洲也成立了或正在筹建旨在促进相互经济关系的区域性合作组织。

当然,要推进南南合作并非易事。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资金、贸易、技术等方面仍处处受制于发达国家。同时,在第三世界内部,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不同类型国家(如产油国和非产油国)对南南合作各有不同观点,存在分歧。再加上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纠纷,给南南合作造成了困难。但是,改革不平等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公正的新秩序,是第三世界人民的人心所向,是在曲折中前进的一股历史潮流。

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独立和离心倾向增强

如前所说,由于实力对比的变化,美国控制和操纵其盟国的能力大为削弱。结果是,西欧、日本对美国的独立自主和离心倾向进一步增强。1982年6月在波恩召开的北大西洋联盟十六国首脑会议上,欧洲几个主要大国公开提出“33年前建立的大西洋体制已经过时”,“联盟必须彻底改革”。会议通过的《波恩宣言》明确提出:美欧间将保持“一种完全平等的伙伴关系”,谁也“不居支配地位”。这表明,在世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美欧矛盾更加激化了。

1982年美、欧、日本的矛盾不仅表现在连续不断的贸易摩擦上,而且突出地反映在对苏政策、对东欧政策、南北会谈、阿以冲突等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

苏联入侵阿富汗后,美国对苏着重采取“强硬”政策,加紧对苏制裁,而西欧则主张继续保持“缓和”局面,反对尖锐对立,因而在对苏制裁方面只是敷衍了事。从美国的角度看,一切从与苏争霸出发,这是它的战略核心,而把西欧盟国置于从属地位,要求它们服从于美国争霸的需要。从西欧的角度看,通过“缓和”政策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增加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回旋余地是有利的。在争夺欧洲军事优势的问题上,美国强调部署中程导弹,只要战争不殃及美国本土,不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同苏联较量一下。西欧由于直接面对苏联的军事威胁,首当其冲,又担心美国的核保护伞靠不住,故强调同苏谈判,尽量避免在欧洲迎头相撞。波兰实行军管以后,美国坚持对苏、波实行经济制裁,而西欧、日本等国虽警告苏联不得干涉波兰,却公然拒绝对苏、波的经济制裁。1982年美欧围绕天然气管道问题的激烈争吵长达半年之久。“四大盟国”英、法、西德、意大利全都不顾美国的制裁措施和禁令,与美国公开对抗。经过一再争论和协商,最后由于美国作了让步,撤销了制裁,双方才达成协议,美欧关系有所缓和,但西欧照常同苏进行天然气管道交易。在中东问题上,美国一味偏袒以色列,拒不承认巴解组织,而西欧国家则强调必须让巴解参加中东和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推进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对话等。在非洲,以法国为主,采取了与美国不同的作法:它反对南非种族主义,结好前线国家,改善同对苏联友好的非洲国家关

系等。在拉丁美洲,不顾美国的反对,西欧有些国家支援萨尔瓦多游击队,给尼加拉瓜提供军援。在南北关系上,西欧和日本也批评美国对南北对话的僵硬态度,强调促进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是西方摆脱经济危机的重要出路,认为改善南北关系也是西欧、日本发挥独立作用的重要一环,因此积极发展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

总之,美国由于经济地位的相对下降,其作为霸主地位也有所动摇;而西欧、日本由于经济实力的相对增强,政治上要求有更多的发言权。它们反对两个超级大国垄断国际事务的“两极”世界,谋求世界向“多极化”发展。

但是,西欧、日本的独立倾向尚未达到与美分道扬镳的地步,尤其是日本对美国的独立性受到更多的限制。面对依然存在的苏联威胁,西欧与日本在军事上仍需要美国的核保护,美国在同苏抗争中也需要西欧与日本的支持。因此美国同其盟国势必在不断争吵中谋求妥协。

东欧探索自己的道路

1982年,苏联同它的东欧盟国之间的关系经历着深刻的变化。苏联力图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继续控制东欧,但是,波兰局势的持续动荡和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它同盟国的控制和影响减弱了。1982年,苏联在提供经济援助和硬通货、石油、天然气的供应、进出口商品的定价等问题上,对东欧各国都采取了限制和较前苛刻的作法,从而引起东欧国家的不满。从1982年起,苏联把供应东欧的低价石油和天然气减少了10%,把出口商品价格大幅度提高,使东欧对苏的贸易逆差1982年比上年增加三分之一。结果是东欧国家纷纷扩大同西方的经济联系,以减少对苏联的依赖,并且对长期以来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国内经济和社会体制的有效性进一步产生了怀疑,它们开始寻求适合本国国情的独立的建设道路。苏联鉴于本身的困难和波兰事件的教训,为了缓和同东欧盟国的关系和减轻对东欧的经济负担,也不得不放松一些对东欧内部事务的控制,容许东欧进行一定范围的社会经济改革,容许东欧各国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程度的“多样化”。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也不得不承认“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国家有不同的内部发展水平和外部条件”,他承认“已经产生了不得不铲除的错觉和不得不消除的错误”。这表明,东欧国家反控制的斗争已迫使苏联考虑调整对东欧的政策,苏联对其“大家庭”的控制进一步削弱了。

这里还需要提一下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动向。1982年,越来越多的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力求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实际情况结合起来,探索本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并主张党与党的关系应置于独立、平等、互不干涉这些原则的基础上。许多执政的和尚未执政的共产党都在进行独立思考,寻找自己的发展道路。这也是独立自主潮流的一个重要表现。

第四部分：中国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 在对外事务中，中国奉行独立自主、反霸和 维护世界和平的政策，积极加强同第三世界 的团结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新成就

在党的十二大和五届人大五次会议的鼓舞下，1982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工农业生产和国民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全面高涨，粮食和棉、油、糖等经济作物都获丰收，副业、林业、渔业和牧业也有较大发展。中国的对外贸易有了较大幅度的上升。在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声中，中国经济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国际局势动荡不安的情况下，中国实现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

中共十二大指出：“我们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同我们履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崇高的国际义务是一致的”。“中国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也不受任何人的唆使和挑动。”

正在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中国人民希望有一个较长时期的国际和平环境。但是，事实告诉人们，要真正维护世界和平，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反对霸权主义。因此，谁搞霸权主义，我们就反对谁。谁在哪儿推行霸权主义，我们就和那里的人民一起反霸。

我国是愿意改善同苏联的关系的。从1982年开始，两国副外长已经进行了两次磋商。我国严正指出，要使中苏关系得到真正的改善，苏联必须改变威胁我国安全的霸权主义行径，排除中苏关系存在的障碍，即：苏联支持越南侵略柬埔寨，苏联入侵阿富汗和苏联在邻近我国边境驻扎重兵。如果这些现实的威胁不解除，就不可能真正向着正常化发展。

我国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改善，但是决不容许美国侵犯我国主权，干涉我国内政。1982年8月17日发表的中美联合公报，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是指导中美关系的根本原则，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等原则。但是公报发表后，美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并在限制中国纺织品进口和技术交流方面对我国采取歧视政策，甚至制造“胡娜事件”等。对于美国政府的这些行径，我国也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为了维护和平，我国反对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的军备竞赛，我国在联合国讨论裁军问题时要求拥有最庞大军事机器的苏美两国首先把军备裁减下来。

1982年是中日建交十周年，两国总理进行了互访。赵紫阳总理访日时强调在“和平友好、平等互利、长期稳定”三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中日睦邻关系。两国之间在经济合作和友好来往方面有许多进展，但是，中日关系不是没有波折的，1982年发生的教科书事件，经过中国政府的交涉，和包括日本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日本政府已同意修订。1983年2月，日本首相中

曾根康弘派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进为特使来华。双方重申中日关系不应该受国际风云变幻的影响,发展中日友好关系不但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这一年多来,我国发展了与西欧各国的关系。先后来我国访问的有英国首相、联邦德国总统、卢森堡首相、欧洲共同体主席。1983年5月,法国总统来访。在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期间,双方会谈了我国收回香港主权问题,这个问题还要继续谈判。

我国与东欧国家的关系也有值得注意的新发展。1982年罗马尼亚党政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访问我国。1983年5月我国胡耀邦总书记访问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我国外交部副部长和苏欧司长访问了其他东欧国家。

1983年4月间,赵紫阳总理出访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这是我国总理首次访问大洋洲国家,这无论在发展双边关系方面,还是维护亚太和平方面,都具有深远意义。

和第三世界同呼吸、共命运

加强与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是我国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1982年以来,我国在联合国和一切国际场合和交往中继续明确地、有力地支持柬埔寨人民和阿富汗人民的反抗侵略的斗争;我国把坚决支持非洲人民和阿拉伯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南非种族主义和以色列扩张主义的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主义义务;我国也支持拉丁美洲人民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主权,发展民族经济的斗争。

我国和第三世界各国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这一年多来,彼此之间的友好来往较前有显著增加。金日成主席来我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在中朝友谊史上谱写了新的篇章。民主柬埔寨联合政府三位领导人西哈努克主席、乔森潘副主席、宋双总理先后来访,加强了中柬两国的传统友谊。其他来访的亚非拉国家领导人有摩洛哥首相布阿比德、几内亚比绍国家元首维埃拉、阿尔及利亚总统沙德利、利比亚国家元首多伊、佛得角总统佩雷拉、扎伊尔总统蒙博托、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秘鲁部长会议主席乌略亚、巴基斯坦总统齐亚·哈克、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泰国总理炳·廷素拉暖、孟加拉部长会议主席艾尔沙德、约旦国王侯赛因、土耳其总统凯南·埃夫伦、埃及总统穆巴拉克、塞舌尔总统勒内等。他们分别同我国领导人恳谈双边关系,共商世界大事,扩大了合作,加深了了解,为国际反霸斗争和世界和平事业作出了贡献。

1982年我国领导人也频频出访亚、非、拉国家。1982年4月,胡耀邦、邓小平同志应邀访问朝鲜,为发展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之间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奠定了新的基础。从1982年12月到1983年1月,赵紫阳总理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几内亚、加蓬、扎伊尔、刚果、赞比亚、津巴布韦、坦桑尼亚和肯尼亚等十一个非洲国家。这是中国和非洲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我国同第三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贸易来往、文化技术交流又有了新的发展。1982年,我国同第三世界贸易总额约为100亿美元左右,约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一。我国还向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并积极探索经济合作的新途径。作为第三世界的一员,中国积极参加并推动了南南合作。

总之,中国为第三世界的团结合作和捍卫第三世界的利益而进行的斗争,赢得了第三世界各国的好评;中国在对外事务中强调独立自主和团结反霸的方针,在第三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1982年的国际形势证明,独立自主和团结反霸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各 国 概 况



亚 洲

中 国

国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

面积 约 960 万平方公里。

人口 101,541 万人(1982 年年底。台湾省未计算在内)。29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汉族人口占 93.3%；各少数民族人口占 6.7%。

首都 北京，人口 9,230,687 人(1982 年人口普查。其中 9 个市辖县的人口 3,632,715 人)。

国家主席和副主席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副主席乌兰夫(1983 年 6 月 18 日当选)。

政 治 1982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在北京召开。这两个会议做了意义深远的工作：制定了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正确纲领和积极稳妥的新的五年计划，通过了建党以来最好的党章和建国以来最好的宪法。全国的政治局面进一步安定团结，国民经济继续稳步前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有了新发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就，人民群众的生活也有新的改善。

为了有效地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自 1982 年年初开始，着重抓了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到 1983 年年初，中央党政机关机构改革的第一阶段任务基本完成，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地、自治州、市的机构改革正在逐步展开，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已取得初步成果。1982 年 3 月和 1983 年 3 月，举行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民文明礼貌月”活动，并在中央和省一级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以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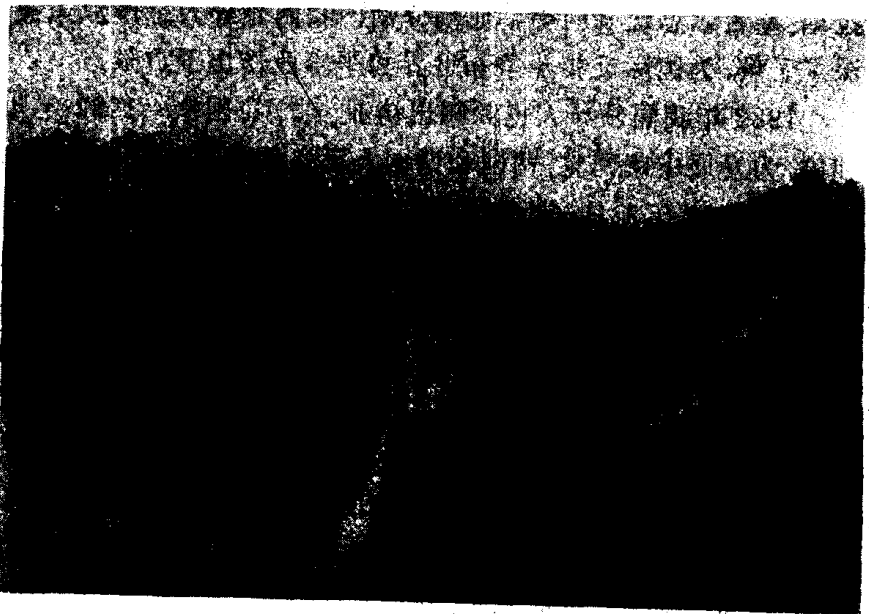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1982 年

11 月 26 日—12 月 10 日举行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1983 年 6 月 6—21 日举行的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和决定了新的一届国家领导人员，组成了新的国家领导机构，进一步完善了国家领导体制；会议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198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1982 年国家决算，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由委员长 1 人、副委员长 20 人、委员 133 人组成(1983 年 6 月 18 日选出)。

委员长 彭 真

副委员长 陈丕显 韦国清 耿飚 胡厥文
许德珩 彭 冲 王任重 史 良(女) 朱学范
阿沛·阿旺晋美 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
赛福鼎 周谷城 严济慈 胡愈之 荣毅仁 叶 飞



气势雄伟的长城